

张元济致缪荃孙函札释读

何 毅 李天道

近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缪荃孙等人函札》中,看到张元济(1867-1959)致缪荃孙(1844-1919)书信六通^①,为《张元济全集》^②及《艺风堂友朋书札》所未收。信函主要涉及古籍收藏和刻印等事项,于进一步了解缪荃孙、张元济这两位中国近代名士的交游情形以及中华典籍之流播过程,皆有一定的意义,兹予整理公布,以为相关学术研究之参考。

—

小山老前辈大人惠鉴:

昨游杭旬日归,奉还教,敬承道履康强,忭慰无似。承示影印古书之难,虑周藻密,相贶以深,不特启发颛蒙,亦具徵维持不朽之盛业,用意良厚,令人悚然钦佩。此举本为冷淡生活,区区掇拾,亦期寓保存于流传之中,非欲藉以求利,故每月只拟印行一种,如卷帙较大,则两月一种,尺寸虽不能悉照原书,亦必视巾箱本张而大之。今附呈大小纸样两页,即拟以此为率,再大于此,则略为缩小而注明原书尺寸,此用金石家编刻碑版之例,倘犹不失大雅。至描画所忌,虫蚀之虞,皆不得不力戒预防,自应用上品纸墨,并精慎从事,诸弊似可免去。印章模糊自是可厌,惟用朱色套印可以矫之。上所云云,未知是否有当,仍乞不吝赐教,乐于终始。即拟以鉴定之席属之老成同志,中如孙问清前辈及罗叔蕴、陈仕可、董绶金诸君,均已函商及之,自必赞成者多承假精本,喜出望外。闻尊著《艺风馆藏书录》行世已久,可否先惠一册。春华挹抱,撰杖遄临,伫侍琴觞,罄申款曲,无任翘幸之至。肃复,敬请颐安,惟祈爱鉴不悉。

馆晚生张元济顿首 闰二月二十七日

此函用印有“永申昌制”字样的红笺纸书写。查缪荃孙1919年去世前二十年间闰二月者为宣统元年(1909),因此该函当作于是年闰二月二十七日。

①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函中所说影印古书之事,当指编印《四部丛刊》。从函中所云,知缪荃孙也是此事之积极倡议者。己未(1919)十月张元济起草的《印行〈四部丛刊〉启》即曾明言:“缪筱珊先生提倡最先,未观厥成,遽归道山,谨志于此,以不没其盛心。”^①函中称此举“区区掇拾,亦期寓保存于流传之中,非欲藉以求利”,《四部丛刊》从1909年开始计议,到1923年共出三编六批,收入古籍323种,8548卷,对保存中华典籍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有人指出,由于丛书部头太大,一般寒士和读书人难以购买,对于文化普及和研究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②。看来读书人和出版人的利益很难完全一致。

二

小山老前辈大人侍席:

中秋节后有山左之游,踰謁孔林,经行沂兗聊,浪至四十餘日。其时闻撰杖枉顾,遂至相左,不得迎奉履綦,良用歉恨。还沪后清理积冗,久未得暇裁复。月初旋里祭奠,归又接奉手书,俱承壹是。惟以感触时会,遽辞北上,高尚是式,然重为斯道惜矣。袁处书价至银数五千,犹以为少,此断非吾辈所能想望,在伯夔^③或可许以此数耳。旧书摹本上石自为最善,但摹手良不易得,承示托丁修甫^④于杭州觅之,当致函往询之也。出版之书,呈请禁止翻印。向例进呈须附送样本存案。大著《续碑传集》行可杀青,鄙意且俟工竣时先刷一部寄至敝处,即可代摆,无须费用也。近缘收购旧书,得昭文张金吾写定《论经堂续经解》稿本,全部书凡八十餘种,中由文澜阁钞本录出为多,间有注为影宋本、明本及旧抄本者,意在继通志堂而起。惜当时未及刊行,而遗稿流传,独未散失,可为幸事。惟其中缺佚不少,颇欲钞配完全,以存名人手泽。前曾面商,拟抄罢里瞿氏旧书及江南图书馆所收丁氏善本,已蒙俯允,感幸莫名。兹检张氏稿本,所缺各种大半,皆瞿、丁两氏所为用,特缮上原书目录,载明求抄之本数卷数,并附上纸片,仰祈鉴核后分与写手(其仅缺数卷者,并将纸片就原钞影写数行计共八种,使写得依样缮录,免致同系一书前后行款不一也)。先将八种就图书馆中丁氏之书补录应需写工知,乞示明寄奉。又其中有影宋景德本《仪礼疏》五十卷,艺芸精舍曾有刊本。《非诗辨妄》二卷、海宁蒋氏《涉闻梓旧》亦经刊行,但此二书近来均甚罕购。尚有刘贞《诗义》八卷,检阅各家书目,均不记录,不知复从何处得以补抄。其他或别有考订,均求指教不吝。老成耆宿

①《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58页。

②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页;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22页。

③伯夔:即袁思亮(1879-1939),字伯夔,湖南湘潭人。袁树勋之长子。曾任北京政府工商部秘书、国务院秘书、印铸局长等职。富藏书。

④丁修甫:即丁立诚(1851-1912),字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侄子。

缀古振今，斯为盛事，非止弇陋企仰，亦月霄先生之灵凭之而不泯也。冬寒，惟卫道崇掇。祇请大安。

馆晚生张元济顿首 十一月廿三日

此函用印有“同益泰制”字样之朱色笺纸书写。张元济宣统元年十月廿九日致函蔡元培，称：“八月望后赴山东登览名胜，并搜罗旧书数种，往返四十餘日^①，据此，则本函当写于是年十一月廿三日。

函中所述“袁处书”，当指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藏书。张元济 1911 年 9 月 12 日致缪荃孙函曾云：“袁氏书索价过昂，无可于商，只得还之。近闻袁观海备价收回，于义固当也。”本函中则称袁树勋对五千两银的书价仍不满足，而其子袁思亮则或可接受此价，说明袁树勋之要价确实较高。

本函中较多地讲到了张金吾《诒经堂续经解》之事。张元济前后多次叙述购藏此书之过程，张元济 1911 年 3 月 23（二月廿三日）致汪康年函曰：“弟于去年搜求古书，购得张金吾《诒经堂续经解》清稿百数十册。”^②而据《涵芬楼烬馀书录》“序”中所云，则此书为张元济向太仓譚闻斋顾氏后裔购买其他书籍之后，书主顺势推销之物^③。虽为无意间所得，张元济还是十分得意，并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补足该书。他在戊辰五月所写《题张月霄〈诒经堂图〉》中回忆说：“诒经堂者，昭文张月霄先生藏书之所也。曰《续经解》者，所以继通志堂而作也。书凡数百巨册，稍有欠阙，然存者尚什之八九。余为之补写，顾有罕见之本不易得，故犹未卒业。余欲竟月霄之志而未逮也。”^④本函中，张元济欲通过缪荃孙向瞿氏铁琴铜剑楼及江南图书馆中丁氏善本书室藏书求钞所缺各书，就是其补足《诒经堂续经解》之一部分。作为书友，缪荃孙也确实为张元济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孙毓修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致函张元济：“缪小山于三月间来申，至馆纵观藏书。《非诗辨妄》二卷已钞好交来。……小公来时，承以《艺风藏书志》刊本见贻。馆中缺书，不特可向江宁图书馆钞补，亦可向艺风钞补也。”^⑤可惜的是，这部得之不易的古籍也在 1932 年毁于日本轰炸上海的炮火之中。

三

小山前辈大人阁下：

得二十八日手教，敬承壹是。所呈书目纸片，均蒙鉴核，并指示缺佚出处，默识三篋，如飨五经，感佩感佩。江苏议员云云，何至卤莽如此，未知议

①《张元济全集》第 3 卷“书信”，第 453 页。

②《张元济全集》第 2 卷“书信”，第 199 页。

③《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中册），第 343 页。

④《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 1120-1121 页。

⑤《张元济全集》第 1 卷“书信”，第 534 页。

者谁何，报章却未登载。群言淆乱之时，容或有之，既已议驳，愿公为斯道益任艰巨，无遽为浮谈消沮，幸甚幸甚。图书馆开办有期，极拟观光，年内有暇，或先趋前聆教。丁氏旧藏善本极多，尚有他种，欲一检阅并托借抄也。《诗传旁通》、《续礼记集说》均当如诒觅购，惟洪鲁芑先生今在何许，尚乞示知，或可因缘得之耳。泐复，祇请道安，诸为朗照不备。

馆侍张元济顿首

敬再启者：近有人持元至正杭州本《宋史》来售，检阅《本纪》第三十五第八页尚存，第九页亦不误。惟钞配四册，卷首在内，殊为可惜，未知实值几何，承乞核示。

再，寒家旧有涉园藏书甚富，近阅叶鞠裳前辈《藏书纪事诗》注，有“《涉园书目》四册，不分部类，只云第几橱第几格”等语，元济生晚，不获睹先人手泽，不知老前辈曾见过否，并祈示及为荷，敬请台安。

元济再顿首。 十二月初三日

此函用印有“同益泰制”字样之红色笺纸书写。张元济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三日函中称：“先将八种就图书馆中丁氏之书补录应需写工知，乞示明寄奉。”本函中“所呈书目纸片，均蒙鉴核，并指示缺佚出处”云云，或即是对前函所说之事的回应，因此，本函或当写于该年十二月初三日。

函中所云《藏书纪事诗》注引《涉园书目》等语，系该书卷四“盐官城畔螺浮宅……图书松下已无多”一诗注引《持静斋书目》卷二之“拾园张氏书目”条，原作：“精钞本，不著书籍原委，但列第几架第几层，某函某书而已。”可见持静斋主人丁日昌不仅藏有该书目，还比较仔细地读过。据《涵芬楼烬馀书录》“序”，丁氏持静斋书散出后，张元济也辗转得到了几种，未知《涉园书目》是否也在其中。

函中所云元刊《宋史》之相关情况，张元济在致孙壮函中也曾提到。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910年1月14日）函曰：“又闻琉璃厂某店有元刊《宋史》残本一部，乞代访查共缺若干册？需价若干？”^①十二月十八日（1910年1月28日）又函曰：“元刊《宋史》如公能自鉴别最好。附去考据一纸，祈察核。”所附一纸中则云：“《孝宗本纪三》（即卷三十五）第八页系‘黎州边事随宜措置’八字开首，若明成化本则无此。又第九页明成化本系‘措置营砦，检视沿江守备’至‘九月己酉杨存’止，共四百字。实系卷三十三之第十一页，误刊于此。若元刊，则不然。”^②这显然是张元济把最能鉴别是否元刊的两个表徵写给孙壮，请他以此去察核琉璃厂之本是否真正的元刊本。本函中所称之至正《宋史》《本纪》第三十五第八页不缺、第九页不误，按照张元济的鉴定标准，不应该是明刊而也可能是元刊。显然比一般所见明刊本要珍贵。然又不知其实实在的

①《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第502页。

②《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第502页。

价格,因向缪荃孙求教。不知本函中所说某书估持售之《宋史》,与琉璃厂某书店之《宋史》是否同一部书,但张元济 1910 年 2 月 3 日致函缪荃孙则曰:“前见元刊《宋史》,似系明印,且索价过昂,只得放手。”^①看来,某书估所持售之本,张元济并没有购存。他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中所介绍的元至正刊本,则为北京图书馆所藏^②,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

四

小山老前辈大人阁下:

献岁发春,伏惟动定多福,敬颂敬颂。江南图书馆可以保全,闻讯甚喜。黄氏题跋抄奉六种,先寄去,续有检得,当再录呈。前函称另觅得一种,近日知即据江刻录出,但不知何以与潘刻有重出者,是可怪也。承示笔记二则,于寒家谱系略有舛误,“初曰庵诗评”,系“初白庵”之讹(仅据来稿更正,不旁及),别录一纸呈览。先六世祖刊《王诗李注》,系据元刊本。去岁有人持一翁覃溪校影宋钞残本来,与丁氏所藏抱经校本正合,索价二百餘金,检视亦无卷三十及五十末页,故仅与值百二十番,未满足其欲,遂携去,翌日往追,已无及矣,惜哉。得鄂友书,惺吾允假钞李注两卷缺页,然尚未寄到,果能觅得,拟将原书影印并补足两半缺页,以竟先志。至《带经堂诗话》(仅有粤东翻刻本)、《词林纪事》迄未觅得。甚矣,服膺食德之不易也。惺吾藏书有出售意,已托人往索书目。老前辈想都见过,究竟实值几何,元济拟于二月六日自上海起程,期以半年归国,购价过钜,须归后方能再谈。不知惺吾能否久待,又不知日本人能不来夺否耳。肃复,敬颂春祺。

馆晚生张元济顿首 正月初九日

该函用印有“高三益监制”字样的红色笺纸书写。张元济 1910 年 2 月 15 日(新正六日)致孙壮函称:“弟今春二月有欧美之行,定二月初六日动身。”^③ 2 月 23 日即一月十四日又复信蔡元培说:“弟拟二月六日出洋游历,先到伦敦,大约四五月间可至柏林,借图畅叙”,因此,本函即当作于 1910 年正月初九日。

本函中,张元济重点提到了其先祖编撰和刻印书籍之事。首先是其六世祖刻印的《王荆公诗注》。他曾于《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中《王荆公诗注》一条批注道:“余家藏本。壬子正月在位西先生子伯綱处见有目录一册。位西先生有长跋在卷端,言得于京师,价只八金。书中并无印记。邵跋云卷三十、五十页均缺,亦无年谱。以是知为余家旧藏。”^④1917 年 12 月 12 日为乾隆六年海盐张氏清

①《张元济全集》第 3 卷“书信”,第 495 页。

②张元济:《校史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123 页。

③《张元济全集》第 1 卷“书信”,第 503 页。

④《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上册),第 9 页。

绮斋刊本《王荆公诗笺注》题识云：“丁巳阳历十二月十二日，书友李子东以此书来。余以银币廿一元购得之。并前所得，此为第十六部矣。时余正影印元本，刘翰貽世兄又以新收残宋本六册借余校对，即芭堂先生识语所载者。”^①张元济先后收藏《王荆公诗注》已达十六部之多。他在题跋张氏涉园刊本《词林纪事》时曾说：“余每遇家刻书，如《王荆公诗注》、《带经堂诗话》、《初白庵诗评》，必出资收回。”^②其对先世文功之珍重由此可见。

据张元济《影印本大德本〈王荆文公诗〉后跋》，他曾先后用杨守敬藏本、傅增湘购得之季振宜藏本、日本长尾雨山摹写之宫内省藏书寮本、江南图书馆藏残本、刘承幹藏残宋本，补足了其六世祖乾隆年间刻本所缺之三十卷、五十卷缺页及其他原缺各项，使该书终于得以全部复原补足，并于壬戌（1922）影印出版^③，使先世文绩得以流传。民国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致函张文龙、张云鹤、张俊等曰：“元济近年搜集涉园旧藏各书……先人手泽阅百数十年而后归于其子孙，不可谓非祖宗灵爽之所凭矣。昔寒苹公印《王荆文公诗注》，曾缺去年谱及卷三十、卷五十之末叶，毕生访求，卒不可得。今元济购得一部，而所缺者具在。今拟重印，藉偿先人未竟之志。”^④丁巳年十月卅一日致刘承幹函曰：“近日续印《王荆文公诗注》，拟再乞假宋残本一校。”^⑤同年十一月三日又致函刘承幹：“承借残宋本《王荆文公诗注》六册连匣，谨已奉到，感谢不尽。”^⑥本函则提及向杨守敬借抄缺页之事，这些往来书信皆为张元济竭力补齐《王荆公诗注》过程之力证。

对于六世祖刻印的《王荆公诗注》，张元济收藏了不下十六部，而六世祖辑纂之《词林纪事》、《带经堂诗话》等，张元济虽也尽力获求，但所得并不甚多，民国九年庚申十月为《词林纪事》作跋时称，“此书得之最迟，兹为第一部”^⑦。但在道光十五年重修本《词林纪事》题识时，却称癸丑七月（1913年8月）得自日本东京文求堂之该书为第三部^⑧。获得在前者，反倒部次靠后，不知何故。丙寅重阳日为商务印书馆影印道光重修本《词林纪事》题跋时对该书给予较高评介，又说：“余搜求是书，凡数十年，至今仅得五部。”^⑨因为流传少而不易得，所以，张元济就决定予以影印以广传布，1926年十一月卅日致周庆云函云：“先六世祖宗櫟尚辑有《词林纪事》、《晴雪雅词》，现正付印，一俟出版，

①《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56页。

②《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83页。

③《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56-1057页。

④《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第266页。

⑤《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第418页。

⑥《张元济全集》第1卷“书信”，第418页。

⑦《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83页。

⑧《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83页。

⑨《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下册），第1084页。

当再呈阅。”^①

五

艺风老前辈大人惠鉴：

奉覆示，敬悉《类说》刻本未之见，不审较钞本如何。敝处所有亦旧钞，恐不及明本也。《龙川》^②、《志林》^③、《仇池》^④均在排印中，容再呈政。前奉假《儒学警悟》三本，校钞《扞虱新话》二本，又目一本，汲古刻《扞虱新话》六本特奉还，祈督收。《儒学警悟》至佳，凡《新话》所引经籍皆与宋本合，毛刻固远逊，即尊校朱笔所据旧钞十五卷本亦相去千里。此书卷首当有各书目录，《新话》卷二、卷六均有脱叶，适缺七则，不知其次第，谨另纸写上，祈暇时查出，批示敝处，拟仍照毛刻排印，将《儒学》本目录卷第注于毛刻目录之下，庶阅者知《儒学警悟》之佳，想见人间孤本尚在云轮阁中也。再《新话》，《宋志》作八卷，与此适符，并可证《宋志》之不误。谨以奉闻，此叩著安。

馆晚生张元济顿首 八月五日

按，此函用印有“商务印书馆用笺”字样之朱丝竖栏笺纸书写。

傅增湘壬子（1912）八月十三日曾致函张元济曰：“《儒学警悟》明钞十册，赵贾意在售百元以外，不知小山尚欲得之否？此亦罕见之品。”张元济则在傅增湘之来信上批道：“果系明钞十册不衬装，百元乞代留。”^⑤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癸丑（1913）年正月廿五日记：“菊生送《儒学警悟》及《后村集》十册来。”本函中未明确说其向缪荃孙借抄之《儒学警悟》的具体情况，但据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儒学警悟》四十卷”条，傅增湘致张元济函中所推荐之明抄本《儒学警悟》，最终为缪荃孙所购藏。如果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中及缪荃孙日记中所提到的《儒学警悟》与本函中所说的《儒学警悟》有联系，那么，可以推测本函大致写于1912至1913年之间。

函中所云《类说》刻本，疑指缪荃孙所藏之明刊本《类说》，《涵芬楼烬馀书录》著有此书，可见最终转到了张元济手中。这是缪荃孙之不幸，但又是张元济及涵芬楼之大幸。

六

小山老前辈大人阁下：

今日在敝馆编译所恭候台从惠临，至午后陶子麟来，始知因风不出

①《张元济全集》第2卷“书信”，第505页。

②《龙川》：指《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宋）苏辙撰。

③《志林》：即《东坡志林》，（宋）苏轼撰。

④《仇池》：即《仇池笔记》，（宋）苏轼撰。

⑤《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第275-276页。

门,未获晤教,怅望之至。刻活字事已与子麟开议,拟即选定字样,令试雕百数十字。未知以何体为最佳,请老前辈教之。《三希堂帖》今展启篋检视,拓印尚早,如价不过高,颇欲留之。老前辈如与授经通函,乞询示一价。琐渎主从,敬颂起居纳福。

馆晚生张元济顿首。四月十二日

按,本函用印有“商务顺”字样的朱丝竖栏笺纸书写。

《艺风老人日记》癸丑(1913)年二月十二日记:“接董授经信及《三希堂法帖》,即交法帖与张菊生,得回信。”张元济同年四月十四日致函缪荃孙云:“三希堂帖有日本人愿买,敝处却欲留之。拟请老前辈转商,可否稍贬其值,让归敝处。拟出五百元,并附致授经一信,请先介绍,以后当直接通信,不敢过渎也。”^①所述之事与本函关于《三希堂帖》之情节正相连接,据此推知本函当写于癸丑四月十二日。

《三希堂法帖》汇刻于乾隆十二年(1747),由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负责,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瑋等人镌刻而成。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馀块,收集自魏、晋至明代末年共135位书法家的300馀件书法作品,因帖中收有被当时乾隆帝视为稀世墨宝的三件东晋书迹,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而珍藏这三件稀世珍宝的地方又被称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三希堂法帖》,全称《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墙间。由于《三希堂法帖》收入作品较多且均为名家名作,因此备受学者及书法爱好者之喜好。尤其是早期拓本,其价值更高。张元济之所以几次请求缪荃孙促成购买该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作者工作单位:何 毅,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
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第499页。